

# 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

邵龍寶

上海師範大學

儒家倫理作為傳統文化的表徵、傳統道德的主體，既有阻礙現代化的不相容性，又有為現代化提供動力支援的根源性資源優勢，這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是具體而言，儒家倫理究竟怎樣阻礙又如何推動現代化發展；儒家倫理的哪些成份在起阻礙作用，哪些成份提供了和將要提供哪些具體支援，尤其是在可操作的實踐層面——在現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還很難有一個差強人意的自圓其說，更難有一個實踐上成效顯著的嘗試和應答。其間的原因非常複雜。在我看來，大致有以下四個原因：其一，中國文化歷史太悠久、太複雜，不易辨識與看透。其二，儒家文化的墜落是在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得救亡圖存的急務沖淡或耽擱了對中西文化的比較討論和辨證分析。其三，五四的文化精英在當時的世界潮流面前，因深黯並痛感自己文化傳統的缺失，對自己的文化和國民性的弱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導致矯枉過正。其四，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史上一場空前的浩劫，政治上的“左傾”殘酷地姦污著中國的文明。從世界文化發展的總的歷史來看，儒家是唯一受到自己民族的文化精英徹底批判的文化傳統。徹底批判、拋棄傳統帶來的後遺症後患無窮，其中一個嚴重的後果是無論學者、宣傳教育工作者，對儒家文化只有“學術資源”互相交流的“文化自覺”，少有或根本不敢想將“學術資源”轉化為“知識資源”進入教育層面的“文化自覺”，以為這是“大逆不道”這裏我還指出一個易被忽視的學理上的原因，即對“儒家倫理”這一概念的誤讀，這種誤讀在許多文章中都可看到，即把作為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與作為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混為一談。

## 對儒家倫理的內涵之辨析

儒家倫理最易造成人們理解上的迷惑和歧義叢生之處，是既可把它看成是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又可把它看成是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所謂元典儒學、漢代儒學、宋明理學、明清樸學就其各自而言屬前者，屬古人的生存樣態，可界說為一種已經存在的既定文化，它們以文獻典籍、典章制度、器物廟宇等設施的形式流傳下來，它是自然經濟宗法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的產物；它是我們想要認識的一種客體，是一種我們無法改變的歷史的存在；它是中國歷史文明的積澱，是精華與糟粕在古人生存世界的有機統一。作為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可以理解為形而下的器，如《周易》、《中庸》等典籍已成了文化遺產。它的功能主要是具有歷史意義，可以在詮釋的基礎上對它加以批判性地繼承和應用，認識它的主要目的，在於以它作為一種載體或文化符號來傳達意義，古為今用。

儒家倫理的文化傳統，是指當代社會中那些從歷史上流傳下來，體現民族性格、民族價值觀的道德精神，是歷史變遷的連續留存。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到宋明時期演化為儒釋道三家融合，它們又都生成於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之中，所以呈現出十分複雜的情狀，既有好的又有不好的甚至壞的連續留存，它是動態的、鮮活的、是過去發生的、現在仍保持著的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儒家的文化傳統不像儒家的傳統文化安靜地呆在歷史文獻

典籍和文物典章中，等待現代的學者去發掘它、重釋它、接通它、應用它，它不與現代對立，不必人爲地努力去貫通古今。儒家的文化傳統就是現實，傳統就是我們，它是眼下中國公民思維方式、行爲方式、道德價值、生命樣態、生存智慧和精神方向的文化基因，它甚至可以代表中國現代化特有的一種文化的傾向性，即區別於其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現代化的文化特質。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談到先進文化的內涵時指出：它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種先進文化應“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爲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援。”建設先進文化和現代公民的道德教育體系務必立足“三個面向”，立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這幾方面的內涵，不能只注重一二個方面，忽視其他的方面，不能只注重批判詮釋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還要搞清作爲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即要在活的歷史當中，在現實之中去理解，去把握傳統文化給當下中國人帶來的好的影響和不好的影響，使人們不僅懂得文化典籍中什麼是糟粕，什麼是精華，而且使人懂得什麼是文化傳統留給我們身上的優良的和腐敗的因素。這就是把自己民族的倫理文化傳統當作當下人們所進行的一系列持續不斷的活動和實踐的過程，把它看作正在趨向未來的一種動向，一種自覺地建設先進文化和構建公民道德價值體系的一個動態的過程。任何一位中國人，你可以說你不懂儒學，沒讀過“四書五經”，不瞭解孔子、老子及其學說，但你的行爲、舉止、思維方式、生活樣態裏則或多或少滲透著儒家文化的基因。傳統社會有一大批目不識丁的山村夫老、沒有文字能力的“母親”，成爲中國民族傳統的文化價值和倫理道德代代相傳的傳達者。孔子三歲喪父，可以說沒有得到父親的慈愛，孟子也差不多，宋明儒學的思想家無一例外都受到母親的身教之影響。

作爲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與作爲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既有區別又相互聯繫，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基礎，後者是前者的流變與動態中的發展；前者是靜態中的歷史遺存，後者是動態中的文化在人的心理結構中的積澱，表現爲人們的行爲方式和生活樣態。這樣就得出了第一個結論：詮釋儒家倫理首先要弄清其內涵，又要把二者結合起來加以研究。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既從文獻典籍層面又從現實的人的社會的實際出發，從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這縱橫兩個座標中來考察儒家倫理在當代中國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

## 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

由上述論述可順理成章地推論出以下結論：無論儒家倫理有多少特質與現代公民社會怎樣對立，也不管它有多少特質的精華可以作爲現代公民社會道德建設的文化資源；不管你承不承認它，中國公民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的道德建設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因爲它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特有的，現在仍在發揮影響作用的文化傳統。儒家倫理之于現代公民道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格塑造等的地位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體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的重要地位，不容任何人過份地推崇它、褒揚它、寵愛它或嫌棄它、厭惡它、否定它！它總是不斷地在動態的變異中從過去、現在到無盡的未來流淌在中國人血脈中的文化基因。這是指作爲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的地位。

作爲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地位是可以成爲豐厚的“知識資源”，成爲構建現代化公民不可或缺的人文知識資源。而作爲“知識資源”和“人文資源”作用發揮的大小，又取決於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詮釋、開掘、創造性應用這一傳統文化資源寶庫。詮釋儒家倫理的方法論不能採用簡單的一分爲二法，認爲批判就是棄去糟粕，而繼承就是吸取精華，其實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發揮它對歷史發展的客觀作用，而不是

精華與糟粕部分單獨各自起作用的，簡單的兩分法忽略了結構的整體性和作用的雙向性。儒家倫理中的精華與糟粕是複雜地揉和在一起的。例如整體主義是儒家的一個價值取向，它引導中國人重視家庭、重視民族國家利益，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形成了中華一體的凝聚力，自古以來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正直的中國人發奮向上，不屈服惡勢力，堅持與外來的壓迫作鬥爭，它使海內外華人團結一心，實現了形神一體，在這次申奧活動中淋漓盡致地得到了體現。但整體主義在封建時代是“民本”與“尊君”一體兩翼的整體，它是泯滅個體主體性、創造力的罪魁禍手。它使個人難以在調節公開的行為時承擔重要的角色。它還容易導致權威主義，在廈門特大走私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受賄者因獲知比自己官大的人已經“涉嫌”就以爲自己可以高枕無憂，結果釀成 600 多名黨政幹部牽涉進去的整體犯罪的觸目驚心的特大走私案。又如仁愛思想是有“差等的愛”，首先把愛施予有血緣關係的人，由愛父母、孩子、愛人、把愛心慢慢擴展開來，由愛親人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再擴大到社會、國家是個同心圓，這一思想使孔子榮獲世界上公認的十大思想家之首的美譽。在中國歷史上，這一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殺身成仁，爲國捐軀。以親子之愛爲核心的儒家傳統可以在中國的社會轉型中起到一定的“解毒”作用，即可以相對減少許多社會問題，諸如養老問題、孤兒問題、過分的貧富不均等等。這些是積極因素。它的弊端是可操作性不強，這個同心圓難以切實擴展開來，往往到了家庭就停止了，並不能在操作層面上不受經濟條件和其他條件的制約。在封建時代造就了不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封建偽君子。其次，親親爲仁，只講人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不要公理、法律，生怕對不起與自己關係親近的人，情感浸蝕法律，導致我國社會長期以來權大於法，及腐敗難以徹底根除，這又是糟粕。

批判詮釋儒家倫理的方法論原則又是科學的唯物辯證法。不僅取決於對作爲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能不能超越簡單的“兩分法”，而且取決於我們有沒有對待作爲文化傳統的儒家倫理的科學、正確的態度。這就要涉及到應怎樣看待我們自己，怎樣看待自己的文化傳統，有沒有“文化自覺”意識。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沒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性，作爲中國人在全球化背景下意味著什麼？搞清以儒家文化爲主幹的中華文化對當下中國人的影響與外國文化的異同及其關係。質言之，要搞清儒家倫理的文化傳統中究竟什麼是至今仍在阻礙著我們民族的優良性格，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因素，什麼是與現代化可以相通，並可爲全球化作出自己應有貢獻的文化精華？

不搞清以上幾個問題就說不清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

## 儒家倫理在中國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公民道德是公民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現代化是包括器物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良性互動的動態過程，其中現代化的社會整合的核心是公眾參與和社會生活的開放化、合理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內在要求公民社會的產生，而公民社會的建設歸根到底是通過個人——現代公民來實現，這就決定了中國在現代化、市場化過程中，公民道德建設顯得極爲重要。

公民道德是作爲政治社會的成員在公共生活中相互對待的道德，它是人們對陌生人的恰當的態度和行爲方式，它不是直接地由日常倫理引申，但必須以個人的人格修養作爲前提。公民道德只有在人們可以作爲政治社會的成員以平等的政治地位相互交往的社會才能形成。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臣民道德，因而儒家倫理對現代公民道德的建立有著深層次的對立。但臣民與公民又都是

“人”。人文與科學的區別在於：其一，科學技術的成果一旦為少數人創造發明出來，所有的人有共用的可能，而人文的智慧與經驗之積累，即使上升為理論的作品，要真正變成自己的體悟，變成自己生命的智慧，對生命的意義、生存的價值、理想人格的思考，必須靠每個活著的人自己去體驗，去嘗試、去創造。其二，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日新月異，兩千年前的科技成果只能存放在博物館裏，根本無法與現代發明相媲美，而社會人文科學的成果，無論年代多麼久遠，軸心時代的孔子、老子、佛陀、蘇格拉底的思想與經典卻並不因時而失去價值，伴隨時光的流失甚至會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這大概是圍繞人的生命意義，苦樂，榮辱，生死等人文課題，古人與今人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古人的相對緩慢的生活節奏似乎更便於深入思考人生的真諦，而現代人在為物質上的攀比競爭中很容易喪失了生活的意義。科學並不能全面地提升人生，所以現代人更加需要充滿人文內涵的儒家人生哲學來警醒、省察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人主張，現代化不應以拋棄傳統為代價，建新樓不一定要拆老屋，譜新曲未必不能彈舊曲。何況儒家的文化傳統並非古人的遺存，而是滲透在今人血脈中的基因。對儒家的傳統文化的批判應以對儒家的文化傳統對當下中國人的影響作為前提，對活的文化傳統的理性把握，才能對傳統文化的文獻經典進行有效地批判性詮釋，使之成為“知識資源”，成為凝聚全世界華人的精神財富，成為維護國家統一的牢固堡壘，在文化全球化的衝擊下，它不僅僅有一種抵抗優勢文化擠壓的心理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中國公民的生活原則提供正當性依據。

因而，考究儒家倫理在當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和價值，不能停留在靜態地對文獻典獻的現代詮解上，而應從靜態到動態，把儒家倫理的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加以分析，不僅要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互動中將社會看作是一有機體，還要從全球化、現代性、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的視角加以審視。

### *在全球化語境下對中國公民的警示作用*

經濟全球化不可能淹沒民族文化，而是對民族文化的繼承、創新和走向世界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復興中華文化並為全球化作出應有的貢獻，首先要克服、消除儒家文化傳統給當下中國公民帶來的負面影響。不然你就不能以現代人的嶄新姿態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你會使自身形象醜陋、行為乖戾，不附合國際遊戲規則，缺乏作為文明國度的中國人應有的風采。這些文化糟粕積澱為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是什麼呢？是封建家長制，等級觀念、人身依附、奴僕性格、權大於法、保守心理、官本位、個性不能張揚、獨立人格挺立不起來，拖著一條長長的無形的封建主義的長辮子。這些負面的東西是現代中國公民身上的隱患乃至毒瘤。去除這些東西既要靠制度創新又要靠全民族的反思、教育引導（應該看到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消解這些弊端）這要在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互動中逐步克服。單純的制度創新敵不過“權力真理論”，敵不過公務員們所信奉的按“按長官意志辦沒錯”的集體無意識。誰的心中都明白“第一書紀第一規律”，權大於法，論資排輩在各類單位和部門中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近親繁殖在無形中侵蝕著我們社會的肌體。至於儒學中的精華，深邃的人文精神、“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人格節操，“剛健、弘毅、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與責任感”，“天下為公、愛國為民、義以為上的價值取向”，“寬以待人、厚德載物、注重人際和諧的恕道精神”，“豐富的政治思想、治世經驗、從道不從君的為官之道”，“立品為人、修己篤行、知行統一的道德自覺與修養理論”等，這些都需要在每一個中國公民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身體力行，發揚光大，需要在全球化的參與中與一切優秀的文化傳統交融，對話，讓世界瞭解我們，理解我們。我們不但要輸入文化而且要輸出文化。中國現在外貿上有順差，在文化交流上則是“逆差”，中國人瞭解西方超過西方人瞭解中國。這說明我們的文化有海納百川，有容

乃大的胸懷。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時我們應當有足夠的自信。北京申奧成功和中國加入 WTO 意味著以儒家倫理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生命力。現在的問題是要設法使儒學精華成為知識資源，進入到教育層面，讓青少年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使他們能自覺地在網路上輸出文化，與西方文化對話、交流，在融合中復興中華文化。

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必須糾正以往的失誤：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該批判的未能徹底批判，該繼承和弘揚的未能真正繼承和弘揚。與之相應還要扭轉中國人缺乏歷史意識的毛病。中華民族有 5000 年淵源流長的歷史，而中國的歷史“記憶”卻如此薄弱，近 100 年來中華民族發生了一種“集體健忘症”，尤其是年輕人有些人甚至認為歷史悠久是落後的原因，美國歷史暫短所以發達，他們認為歷史只是很久以前的一段已模糊不清的煙雲，許多偉大的歷史事件過於遙遠，對於今天沒有指導意義。由於複雜的歷史的原因，中國人相當程度上失去了對自己古代偉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崇敬心，不再有人有興趣在大中小城市建造象徵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性格與民族精神的孔子塑像。至於中國人的經典，許多人不知是什麼，或者無知的斥之為封建主義的故紙堆，甚至斥之為“發思古之幽情”認為與現代化節奏格格不入。杜維明說，中國人一方面是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只有短暫的“歷史記憶”。如北京大學有 100 年的歷史，但要把文革時期的資料找出來就非常困難。北大湯一介先生到哈佛訪問，想瞭解他的父親湯用彤在哈佛念書的情況，找到了湯先生和 1915 年到 1920 年在哈佛念書的成績單，也找到了給他講課的老師名字，同時還找到了他是從美國中部一個小學校轉學而來的證明以及介紹人，來美的交通工具。美國人十分珍視自己僅有的三百多年的歷史，採取各處措施用自己短暫的歷史對青少年進行歷史意識教育。所以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人應有歷史意識，不知道歷史就不知道現在，更不知道未來的走向，不知道作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不知道中國文化的深厚意蘊及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這是儒家倫理的第一個作用，它可以警示每一個中國人反思自己作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

### *儒家倫理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建設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建設需要倫理基礎和倫理秩序的支撐與支援，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換主體是獨立、自由的主體之間普遍協作，其運作方式是一種自行組織秩序，它把社會分工與合作從家族範圍和單位範圍拓展到家族以外的公司之間甚至世界性的更大範圍和更多的層次。

市場經濟的發展內在地要求其社會成員擺脫人身依附，確立起具有獨立性的個人。伴隨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具有獨立性個體的人越來越突破血緣和地緣的限制，從注重情感到注重契約化。個人從人身依附中走出，又很容易走入“人為物役”的陷阱。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由獨立的個人組成的建立在一定利益關係基礎上的公民社會得以確立和形成。

市場經濟的發展內在地要求並催生著民主政治的建立，這種政體形式的建立要以個體比較充分地發展為前提，並且要以公民權利至上的基本理念來支援。

民主政治不僅能容納，協調公民個體的獨立自由的發展，而且能消解個體間引發的各種衝突，推動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在自由而有序，充滿活力的互動中健康而穩定地發展。這將帶來政府與公民關係的變化，使得社會主義的現代公民徹底告別官本位社會和政治身份等級社會，逐步走向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法治社會。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內在地要求社會倫理關係的純化，同時必然帶來社會倫理觀念和倫理秩序的深刻變化。其根本點“就是由血緣倫理、地緣倫理、親戚朋友倫理及單位倫理（即准宗法倫理）向適合於整個公民社

會並面向所有公民的普遍倫理轉變”。<sup>1</sup> 儒家倫理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作用的發揮關鍵還在於制度的創設。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方面文化傳統並不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另一方面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或促進作用取決於一定的制度條件。文化是一種“軟體”，只有在一定制度的“硬體”中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制度是文化作用于經濟的根本環節和條件。比如“儒家以人為本的思想，在專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民主制度條件下才能變為現實”，“儒家群體本位主義，在封建制度下，往往成為壓抑個體能动性、扼殺個性的思想工具，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卻可以成為團結合作精神的導向。”<sup>2</sup> 甚至可以轉化為特殊的社會資本。普遍的社會倫理信任可以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或“額外交易成本”。建立一套公正的遊戲規則與民眾的道德信念和自覺遵守規範是一體兩面，市場經濟的前提設定不只是經濟的，還必須是道德的。“必要的公共倫理信念和道德規範，就是市場經濟普遍可能和持久進行的前提條件之一。誠實守信之于交易行為，勤勞節儉之於資本積累，團隊精神之於企業的組織和發展社會道義和人道精神之於經濟管理等等，可以說明這一點。”<sup>3</sup>

儒家倫理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反效應不可低估。儒家倫理的民本思想，元典儒家中的獨立人格不能說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沒有相通相融性，但它們本身並不必然從內在要求民主的發展。因此“希望儒家道德思想必當發展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很難不是一廂情願的願望”<sup>4</sup>

官德是公民道德中最具影響的德性修養，行政倫理是道德發展的高級階段，在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行政倫理處於最高層次。行政倫理的價值基礎是廉政，價值核心是勤政。在傳統文化中不乏廉政與勤政的資源與典範。但自前儒學社會就形成的十分濃厚的社會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的制約下，廉政和勤政的制度保證是皇權的人治。這一遺毒現在又成了孕育腐敗的溫床。

總之，儒家倫理的道德資源只有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建立的互動中反思和批判儒家文化傳統的糟粕，尤其是對為官者的消極影響，才能發揮出其豐厚的優良道德傳統的積極效應。

### *在“知識社會”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中的作用*

知識社會對人文道德素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與工業革命不同，這次資訊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領域的革命，與人們的猜想相反，資訊技術的迅猛發展，人的因素反而上升了。知識經濟的特點，是服務性經濟的在大規模發展，是從單線生產走向個別化總體服務，從而改變了社會的工作形態：從嚴格分工走向群體合作，從繁瑣的科層變為扁而鬆的工作組，知識重心下移，在工作中需要按需的、及時的、集體的建構性學習。新的組織形態，把人從工業社會嚴格的機構和規章中解放出來，要求員工要能溝通、共事、質疑、應變、創新，而人際的交往達到了新的密度和強度，也因此對人的道德價值、情感、良心、精神、責任心、自覺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知識社會容易使人盲目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視目的理性。比如父母和老師（家長、學校、社會）通過某種不約而同的“共謀”，把一個以“應試教育”為核心的理想世界灌輸給青少年。家長成了孩子的上帝，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使他們無法以自己的個性，興趣和才能出發營造適合於自己的理想世界。<sup>5</sup> 虛擬世界使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得到了釋放，但種種失範現象極容易誤導他們的思想。<sup>6</sup> 在西方娛樂文化的衝擊下，青少年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越來越淡薄。只認金錢和名利，不講精神和價值，使一些年輕人失去了同情心，內疚心和羞恥心。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不服從紀律，而且放任、反叛、無心向學，由於社會流行講人權、講自由，所以學生認為自己有自由，沒有人可以說自己、管自己，甚至沒有人可以說自己不是。認為學生與老師，子女

與父母都是平等的，因為大家都是人，學生無必要尊重老師，子女無必要尊重父母。學校只管灌輸知識與技能，訓練應試的本領，以便提升學校的社會地位，學校變成生產產品的流水線，只見物不見人。現在青年人價值危機、信仰危機、無視權威、已成爲世界性問題。

綜上所述，知識社會需要人文精神，價值理想、而正在走進知識社會的人們又容易只見物質、功利，而丟失精神家園。儒家倫理雖然缺乏與現代性聯繫最緊密的科學與民主兩種質素，但如果僅用民主科學這兩樣東西來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資源，（主要是儒學）進行一種判斷，那是愚蠢的。在儒家倫理中有著關於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人的充分自我發展、理性地面對失敗、對待義利、對待幸福、對待生育、生命智慧、精神價值、人格修養等豐厚的資源，它們可以培養中國人的文化能力、倫理的智商、體察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抗爭，使人能更深刻的洞見人世的人文知識、精神價值和人格素養。這些東西不僅不會反對民主，科學，反而使民主與科學的發展有了後盾，更符合中國人走向現代化的特色，這裏的標準是你不能一上來就拿西方的標準爲標準。

事實上，平心而論，儒家文化傳統經過 100 年來的西方文化的衝擊，尤其是經過近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參與全球化的洗禮，它已經融入了許多西方的先進思想和理念，科學與民主這兩樣東西（尤其是前者）開始真正深入人心。世界上恐怕不會有比中國到發達國家去留學深造的人數更多的國家，不會有人數比例那麼衆多的人對英文掌握得這樣好，也很少有像中國這樣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科技後，自己的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只要我們在吸取他人之長時，不要丟失自己的寶貝，只要我們能正視自己文化傳統中致命的弱點加以克服，只要我們在注重四個現代化的同時也注重政治民主化和人的現代化，而且使三者循序漸進，互相促進，互相影響，那麼，中國文化的復興和現代化的輝煌成功必然相互推動，儒家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肯定會日益提高。

## 註釋

1. 龍興海 (2000)。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倫理演變。載《新華文摘》，2000 年 11 月，頁 28。
2. 唐凱麟、曹剛 (2000)。《重釋傳統：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評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1 月，頁 402。
3. 萬俊人 (2000)。《論市場經濟的道德制度》。中國社會科學，2000 年 10 月，頁 13。
4. 李錦全 (1999)。從儒學發展進程看儒學的前景。載《中國哲學史》，第 4 期。
5. 程介明。《知識社會中德育的新使命》。“現代化進程中青少年道德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
6. 俞吾金。《青少年教育的三個世界》。“現代化進程中青少年道德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

## 參考書目

- 張岱年 (1996)。建設新道德—儒學作爲一個整體已經過時。載《教育藝術》，第 6 期。
- 賀來 (2001)。人學研究的三個辯證層次。人大複印資料，載《哲學原理》，第 4 期。
- 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 (2000)。《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 版。
- 龍興海 (2000)。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倫理演變。載《新華文摘》，頁 28。
- 唐凱麟、曹剛 (2000)。《重釋傳統：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評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喻中 (2001)。《法律文化傳統與傳統法律文化》，社會科學報。
- 陳廷湘 (2001)。20 年文化討論的反觀與思考。人大複印資料，載《文化研究》。